

〔宋〕蘇過 原著

舒大剛 蔣宗許 校注
李家生 李良生

斜川集校注

楊明照



巴蜀書社

斜川集校注

○〔宋〕蘇過原著

○舒大剛 蔣宗許 校注
李家生 李良生

楊明照



○巴蜀書社 中國·成都

5474.4

責任編輯:王大厚

封面題簽:楊明照

封面設計:王荅貴

版式設計:王荅貴

斜川集校注

〔宋〕蘇過 原著 舒大剛 蔣宗許等校注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市鹽道街3號

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

四川文瀾電子出版制作中心照排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開本 850×1168mm 1/32 印張:27.25 字數:600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冊

ISBN7—80523—761—1/I·309 定價:55.00圓

蓝生老师指教

蒋宗许敬奉

九七年春

通叶頭稍疎

奉言論頌初嘗劉晚來

起在何如通才人惠廬山茶鄉

兩器不知可毀否并建茗二品

漫納言不罪汝懷不一過叶頭上

賜孫仙尉閣下

十七日

告借一日直向本區嚴九

者欲令物少生治明早至

幸甚



贈

遠夫

眉山蘇過

過

忠獻活邦國名與松岱

尊淒涼幾年後贈印

王其門

遠夫天下士秀氣鍾璵

璠從來萬夫傑不產三

象村

公其往繼之要使風流存



前言

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學年度，楊明照先生舉辦古籍整理培訓班，我講授《三蘇研究》的專題課，並負責該班的結業實習。當時決定選一從來沒有人注過而又具有注釋價值的小家集子供全班練習，於是選中了蘇過的《斜川集》。但由於學習期限太短，最後只要求每個學員各注一篇。學員舒大剛、蔣宗許、李家生、李良生表示願將此集注完，我表示支持，並向他們提供了《蘇過年譜》初稿。結業後，他們四人經過三年的努力，數易其稿，現在總算完成了《斜川集》的編年校注。這就是本書的緣起。

一

蘇過字叔黨，號斜川居士，蘇軾幼子，時稱小坡。生於宋神宗熙寧五年（一〇七二），卒於宋徽宗宣和五年（一一二三），終年五十二歲（考訂詳見《蘇過年表》）。研究他所著的《斜川集》，對了解蘇軾兄弟的晚年景況，徽宗朝的黑暗統治及其對元祐黨人的迫害，以及少有「奇志」卻不得施展的蘇過的苦悶，都有一定的意義。

蘇過在二十二歲以前（一〇七二——一〇九三），跟隨其父宦游南北。「坐見黃州再閨，兒童盡楚語吳歌。」（蘇軾《滿庭芳（歸去來兮）》）——蘇軾貶官黃州給年幼的蘇過（時年八至十三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臣一去闕庭，三換符節。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未經周歲，復興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蠹自不安位。」（蘇軾《定州到任謝表》）——蘇軾在元祐年間的不安於朝，頻繁調動，奔走於朝廷和地方之間，使漸知人事的蘇過清楚地看到了新舊兩黨及其內部的互相傾軋。蘇過後來說：「余幼好奇服，簪組鴻毛輕。」（《北山雜詩》）他從小看輕仕進，與他青少年時代的閱歷是分不開的。

在二十三歲至三十歲的七年（一〇九四——一一〇一）中，蘇軾貶官嶺南，徽宗即位，遇赦北歸，卒於常州（在今江蘇），蘇過一直隨侍從行。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說：「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宋史》本傳也說：「（蘇）軾帥定武（即定州，治今河北定縣），謫知英州（治今廣東英德），貶惠州（治今廣西惠陽），遷儋耳（即昌化軍，治今廣西儋縣），漸徙廉（即廉州，治今廣西合浦）、永（即永州，治今湖南零陵），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需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晁說之《蘇過叔黨墓誌銘》所述略同）在蘇軾三子（長子蘇邁，次子蘇迨）中，只有蘇過始終隨侍蘇軾左右，受蘇軾的熏陶也最深。特別是南遷之行，對蘇過文學成就的影響尤其深遠。蘇轍嘗稱「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見《宋史》本傳）。

崇寧元年（一一〇二），蘇過葬蘇軾於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小峨眉山，次年服除，遂家於

穎昌（今河南許昌市東）。他在《祭叔父黃門（蘇轍）文》中說：「過也昔孤而歸公於許（昌），奉杖履者十春。」據宋孫汝聽《蘇穎濱（轍）年表》，蘇轍卒於政和二年（一一二二）十月三日，這表明，從崇寧二年（一一〇三）到政和二年間，蘇過同蘇轍都閒居於穎昌。崇寧年間，正是徽宗朝實行紹述新政、迫害元祐黨人登峰造極的時期，也是蘇過兄弟生活最艱難的日子。「平生粗知田，疆理南復東」（《和叔寬田園六首》），「布被冷如水」，「悲辛殘炙冷」（《北山雜詩》），正是他躬耕勸作、窮困潦倒生活的真實寫照。晁說之說蘇過「於閒居時且多艱」（見《永樂大典》卷二四〇一所載《蘇叔黨墓誌銘》。按，晁集此銘有缺。下不再注明）。就是因此而發的。在此期間，蘇過和叔父、諸兄弟與同時被禁錮而居許的元祐黨人子弟及門生（如張耒、李廌、范淳父之子范正平兄弟、呂公著之子呂知止等人），時常往來，唱和甚多。

蘇過一生「仕宦之日少」（見《墓誌銘》）。元祐七年（一一〇九二），蘇軾從杭州召回作兵部尚書，蘇過曾爲承務郎（見《宋史》本傳及《墓誌銘》）。其後二十年未再任職。直到政和二年六月，才又出仕。《宋史》本傳及《墓誌銘》都說：「（蘇過）初監太原府（治今山西太原）稅，次知穎昌府鄆城縣（在今河南），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治今河北定縣）。」按：蘇過政和元年作詩《送仲南（蘇适）兄赴水南倉》說：「明年驅車走太行，政坐相如空四壁。」政和二年十月作《祭叔父黃門文》也說：「痛里門之一訣，哭來計於并（即并州——太原）汾（即汾河，流經太原）。」知他任職太原在政和二年。又《予寓洛陽寶壇……》詩說：「此心本洞然，六月遭仇迫。」因此，又知蘇過太原

之行在政和二年六月。在太原，蘇過與府帥張近幾仲及蘇軾門生孫繼志康、趙鼎臣承之等人相得甚歡，詩賦疊作。政和五年（一一一五）冬，蘇過奉命爲鄆城縣令。他在《鄆城縣遷土地祭文》中說：「某以乙未歲之冬，奉敕宰是邑。」乙未歲即政和五年。在他任職期間，鄆城時有水旱之憂，蘇過禱雨祈晴，奔走羣望，不一而已。愛民恤農，一如其父。重和初葉夢得少蘊帥潁昌府，蘇過及晁將之無數、晁說之以道、韓縉公表、范寥信中等人，時常泛舟西湖，酣飲賦詩，佳什累累，人稱盛事（見元陸友《研北雜誌》）。約在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夏秋間，蘇過權中山府通判，「無幾何，以事如鎮陽」，「而暴疾以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墓誌銘》）。蘇過一生的最後十年，僅作過這三任小官，確實是「身處末流，仕又再黜，轉軻（坎珂）道死，不獲措其蘊於天下」（趙懷玉《校刻斜川集序》）。可不爲之太息耶！

二

要了解蘇軾晚年貶官嶺南期間的思想和生活，主要當然應依據蘇軾本人的著述。但是，蘇過的《斜川集》有助於印證、加深、補充對蘇軾晚年狀況的了解。

蘇軾爲什麼不安於朝，最後竟以年近六旬的高齡遠謫嶺南呢？君主多疑，小人多讒，蘇軾又多直言（《次大人生日》：「直言便觸天子嗔，萬里遠謫南海濱」），這就是蘇過得出的結論。他的以古

喻今之作，如《思子臺賦》、《伏波將軍廟碑》、《蕭何論》等，集中反映了這一思想。他在《蕭何論》中說，「蕭何請上林苑以與民，高祖大怒而械繫之」，原因就在於「君疑臣」。自盧綰反，劉邦認為羣臣舉不可信矣，而蕭何「居可疑之地，有可疑之勢」，劉邦欲繫蕭何「久矣」，「請上林苑以與民」只不過是借口而已。蘇過深有感慨地說：「嗚呼，功臣之難，自古而然乎？」《思子臺賦》寫漢武帝巫蠱之禍，譏臣江充與太子有隙，誣告太子埋木人以詛上。太子矯詔殺江充，長安擾亂，言太子反。武帝發兵圍太子，太子出亡自經死。武帝後來憐其無辜，築思子臺。蘇過痛斥道：「聞武帝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陽石公主，亦坐巫蠱誅）而未厭兮，又瘞（埋）禍於宮中。忸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漢武帝「多忌」、「好殺」，把左右的人都當作敵人（戎，古代少數民族），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巫蠱之禍。當他征伐四夷時，似乎是「雄傑」之主，而失道嗜殺時，似乎比嬰兒還更無知：「彼茂陵（漢武帝）之雄傑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於是，「信讒而殺子，隱姦而敗國。」蘇過還進一步揭露說：漢武帝害死了太子就「慷慨悲歌，泣涕躊躇」，而他殺了那樣多大臣、忠臣，「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古往今來，無辜受戮的人太多了，蘇過之所以在《思子臺賦》中大動感情，顯然寓有父親忠而被謗的隱痛。《伏波將軍廟碑》寫東漢光武帝時，伏波將軍馬援自請南征，進軍壺頭，水急不能上，加之天氣炎熱，士卒多病死，馬援亦病卒。讒臣陷之，光武帝大怒，追收其新息侯印綬。蘇過感慨道：「壺頭一蛆（挫敗），讒

人遂入其說，人主一信而不可回。」馬援在南征中嘗食薏苡以祛風濕，並載一車還，以作種子。馬援死後，有人上書說他載的都是明珠玉犀。蘇過寫道：「何薏苡之興讒兮，抱孤忠而不見省。……悲將軍之誰咎兮，死青蠅於祖聖！」主雖聖卻被青蠅所包圍，馬援仍落得「功未錄而罪及兮，掩大德於一眚（過失）」的下場。馬援的遭遇雖可悲，卻廟食百世，名垂千古：「造物者能困其人，而不能困其功名也。」蘇過深信，其父蘇軾雖然也是「抱孤忠而不見省」，讒說入，「人主一信而不可回」，但讒人不可能磨滅蘇軾的「功名」，他的忠義之心仍將為後人所敬仰。

蘇軾對逆境一向能處之泰然。他在渡海去海南孤島時，曾感傷地說：「何時得出此境耶？」但一轉念，他又自我排解道，在茫茫宇宙中，整個中國也不過是一小島而已。盆水潑地，螞蟻以為是滅頂之災，「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道之路乎？」（《蘇文忠公海外集》卷四）蘇過的《颶風賦》淋漓盡致地發揮了蘇軾這一思想。賦的前面大部分描寫颶風之威力，結尾處問道，颶風「果足怖」嗎？他說：「蟻之緣也，吹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在「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上者九萬」的大鵬看來，根本不算一回事。如果有大鵬那樣的胸襟和視野，颶風也就不足稱颶，不足為怖了。「則向之所謂可懼者」，皆「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造成的。元符二年（一〇九九），蘇過還寫了一篇《志隱》，通過主客對話，進一步發揮了蘇軾的隨遇而安的思想。他針對客人「誇三晉而鄙百粵」的觀點，首先闡明了萬物齊一、晉粵無別的思想。他說：「彭聃以寒暑為朝暮，蟪蛄以春秋為期頤（百歲），孰壽孰夭，孰欣孰悲？……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

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雲夢之與孟諸？」他說，儋耳雖是「瘴癘之地」，但也有「可（稱）道者」在：

天地之氣，冬夏一律，物不凋瘵，生意靡息。冬絺夏葛，稻歲再熟。富者寡求，貧者易足。績蕊爲衣，藝根爲糧。鑄山煮海，國以富強。犀象珠玉，走於四方。士獨免於戰爭，民獨勉於農桑。其山川，則清遠而秀絕，陵谷，則飄渺而峩鬱。雖龍蛇之委藏，亦神仙之所宅！

在蘇過的筆下，當時還很落後的儋耳，簡直是人間天堂、神仙住的地方。這正是蘇軾「海南萬古眞吾鄉」的思想。這種萬物齊一、隨遇而安的思想，顯然受了莊子哲學的影響，在當時，對鼓勵蘇軾父子戰勝困難，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其次，蘇過針對客人以鐘鳴鼎食勸其仕進的觀點，相當深刻地揭露了當時官場的黑暗：

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枉尋（屈曲不正，攀援依附）者見容，方枘者必憎。而自古豪傑之士，有不能閭閻之窮，慨然有澄清之志，探虎穴、索驪珠而得全者，蓋無一二也。

官場中容不得正直的人！蘇軾之所以一貶再貶，正因爲他功高名重，方枘正直。鑒於蘇軾的教訓，蘇過表示，他安於眼前置身遼方的生活：

今置身於遼方，如有物之初，余逃空谷之寂寞，眷此世而愈疏。追赤松於渺茫，想神仙於

有無。此天下之至樂也。

蘇過《志隱》的安貧樂道主張，既符合蘇軾的一貫思想，更符合他貶官嶺南時的精神狀態。《宋史·蘇過傳》說：「初至海上，（蘇過）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據晁說之《蘇叔黨墓誌銘》載，蘇軾還準備「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由此可見，蘇軾對這篇文章之重視。

蘇軾遠謫嶺南，嘗盡了世態炎涼。蘇過深有感慨地說：「管鮑久已死，交情雲雨翻。」（《和叔寬贈李方叔》）但是，世間畢竟還是好人多。就在很多人怕受牽連，對蘇軾唯恐避之不及的時候，也有不少親朋好友，甚至素不相識的人，對蘇軾充滿了關切之情。其中有萬里致書的常子然：「嗟我先君，昔遷南夷。萬里致書，公時布衣。同臭使然，忘其禍危。」（《祭常子然文》）有萬里探親，死於途中的舅父王元直：「先君之遷於南也，平昔親舊屏迹不敢問安否者七年。舅氏慨然奮不顧身曰：『公盛時在朝廷，典方面，則往見之；今厄窮瘴癘之地，吾等乃避畏行迹，非夫也！』」率同往者一人，遂獨浮江而下，將自洞庭、桂嶺而南。會先君有詔北還，而舅氏遇疾於途以卒。」（《王元直墓碑》）有不顧朝廷禁令，毅然相訪的李安正、王子直：「紹聖初，先君謫羅浮。是時，法令峻急，州縣望風旨，不敢與遷客游。一夕，蒼梧守李公安正引車騎扣門，請交於衡門之下」（《書漳南李安正防禦碑陰》）。「南行幾萬里，親舊書亦絕。……未著絕交書，已歎交游絕。……怪君一事無，訪我此窮髮。」（《贈

王子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蘇過有一首《己卯冬至，儋人攜具見飲》詩，生動描述了海南人民對蘇軾父子的情誼。這時，蘇氏父子已謫居海南三年，「南音行自變，重譯不須通。」他們同海南人民已經沒有多大的語言障礙了。「父老憐匏繫，肴蔬盛簋饌。」當地父老同情久謫不仕（《論語、陽貨》：「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舊時常以匏繫喻不得出仕）的蘇軾父子，給他們送來的肴疏，盛滿（饌）了食器（簋）。送來的禮物有：

椰酒醍醐白，銀皮琥珀紅。……

薯芋人人送，困庖日日豐。瘴收黎母谷，露入菊花叢。

海蟹羞蚶蛤，園奴饋韭菰。檳榔代茗飲，吉貝禦霜風。

有白如醍醐（酥酪上凝聚的油）的椰子酒，紅如琥珀的銀皮酒，海南廣產的薯芋，海蚶蛤蜊等海味，韭菜、黃芽菜（菰）等菜蔬，可作飲料的檳榔，可禦風寒的木棉（吉貝）。從蘇軾《用過韻，冬至日與諸生飲酒》詩看，這次「攜具見飲」的人，主要是符林、吳子野等當地士人，但當地勞動人民對蘇氏父子也很好。蘇過《夜獵行》詩說，海南多鹿子、野豬，土人常於夜分月出捕取。一天晚上，獵聲震山谷，第二天就有人給他們送野味來。他感謝父老道：「朝來剝啄誰有饋，愧爾父老勤弓戈。」特別是在蘇軾遇赦北歸時，海南人民對蘇軾父子更是依依不捨：「送車反自厓，異獠紛來賓。蛙蜩與蜺醢，敬我如族姻。」（《用伯充韻贈孫志舉》）蘇過自注說：「南夷風俗，非姻家不得與蛙蛤

蟻醬之會。」但他們對蘇軾父子卻例外，完全把蘇軾父子當親人看待。

三

今存《斜川集》中的絕大部分詩文作於徽宗朝，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徽宗朝對所謂元祐黨人的迫害，以徽宗爲首的統治集團的腐朽，以及當時嚴重的階級對立。

崇寧元年（一一〇二）五月，韓忠彥以「變神考（神宗）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的罪名罷相，朝廷再次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的官職，其中二十一人之子弟不得在京師作官。九月，立黨人碑，把司馬光等一百二十人列出罪狀，謂之「奸黨」，御書刻石於端午門，其中就有蘇軾兄弟及其門人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等。崇寧二年（一一〇三）二月，詔黨人子弟不得至闕下。四月，詔毀三蘇等人文集。九月，蔡京又自書「奸黨」名姓，命州縣立黨人碑。崇寧三年（一一〇四）六月，又重定黨人，刻石於朝堂，由原來的一百二十人增至三百零九人。其後對元祐黨人的迫害雖曾有所緩和，但終徽宗朝均未恢復蘇軾等人的名譽。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當年的執政大臣蘇轍，一直閒居潁昌十餘年，不再與人相見，默默以死。這期間，蘇過有很多詠誦蘇轍的詩篇，如「絕口誰能論夢幻，逢人聊只話耕桑。翟公門外常羅雀，要放空階草木長」（《次韻叔父上巳二首》），「枕上軒裳何足夢，壺中天地本來寬。幅巾從此追巢許，永

愧蒼生起謝安」(《叔父生日四首》)；「求田問舍追三徑，面壁灰心過九年」(《次韻叔父黃門己丑歲除二首》)等等。蘇過在《祭叔父黃門文》中說：「公之脫身南荒而歸也，則澹然箕山之下，潁水之濱。友巢由於千載，追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托《春秋》以見志，戮姦宄於灰塵(指蘇轍晚年所作《春秋傳》等)。公雖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泰山，歸之如鳳麟。」這些詩文都反映了蘇轍晚年默默無聞，鬱鬱寡歡，潛心於學術研究的境況。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蘇軾三子均長期沉淪下僚或閒居，蘇過在《送伯達(蘇邁)兄赴嘉禾》中寫道：「我生三十餘，憂患恰半生。……五載卧箕穎，分甘一廬氓。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營。各逐升斗仕，彈冠愧淵明。」蘇過於崇寧二年居穎昌，從「五載卧箕穎」句可知，此詩寫於崇寧六年(一一一七年)，時蘇過三十六歲，在這「三十餘」年中，他有十多年都是在伴父南遷和閒居穎昌的「憂患」中度過的，都在作「一廬氓」。由於生活艱難，他們不得不為升斗之祿而出仕。《送仲豫(蘇迨)兄赴官武昌叙》說：「長兄(蘇邁)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為州縣吏，仲兄(蘇迨)少不樂仕進，親戚強之，今四十有三，始為管庫官。」從「長兄年五十有三」，仲兄「四十有三」，可知這篇叙寫於政和元年(一一一一)，時蘇過四十歲，尚閒居許昌。仲兄蘇迨本不樂仕進，而親戚強迫其出仕，顯然也是為生活所迫。蘇過的《送仲南兄(蘇轍子蘇适)赴水南倉》，生動表現了蘇過兄弟(包括堂兄弟)在從仕上的思想發展過程。早年他們都意氣風發，似乎定有作為；